

晚清浙江京茶庄的歙县宗族伙计

——基于泰昌发介号淳庄的考察

黄一彪¹ 龙登高²

(1.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2.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十九世纪末期,华北花茶消费日渐兴起,远在新安江流域的徽州茶商吴炽甫为了收购和加工茶叶,在严州府淳安县设立了季节性经营的茶庄机构。茶商基于特定的农业周期与地理方位,选择雇佣歙县的昌溪吴氏族人充任伙计,这些宗族成员因而能够实现生活来源的多样化。淳庄则通过对族人的雇佣,减少了招募、管理及解散等环节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金与货物的运输风险并有效缩短了每年的经营周期。淳庄的个案显示宗族成员参与同族茶商的产业经营,极大地增加了个人收入,与此同时茶商得以节省经营成本,从而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是一种双方互益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茶庄;宗族伙计;徽州茶商;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6-0075-14

The Employees of Wu's Clan from She County in the Domestic Tea Fac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Taichangfa-jie-hao Trader in Chun'an County

HUANG Yi-biao¹ LONG Deng-gao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onsumption of scented tea in North China was on the rise. To purchase and process tea, a Huizhou tea merchant named Wu Chifu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set up a seasonal tea factory in Chun'an County, Yanzhou Prefecture. Wu Chifu based on specific agricultural cycle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chose to hire the members of the clan as laborers, so they could diversify their sources of life, turning out Chunzhuang mitigating the transportation risk of capital and goods,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in recruitment, management, and dissolution and effectively shortening the annual operating time. The case of Chunzhuang demonstrated clan members were involved in the industrial management of the tea merchants of the same clan, which greatly increased their income.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 merchant could save operating costs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which was a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arrangement for both sides.

Key words: the tea factory; the clan employees; Huizhou tea merchants; transaction cost

学界对近代中国茶业的研究聚焦于世界市场的变迁,着重探讨产业的现代化转型等相关问题。其

[收稿时间] 2022-0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我国传统工商业账簿史料整理与研究(1500-1949)”(21&ZD078)

[作者简介] 黄一彪(1996-),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和社会史;龙登高(1966-),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史、企业史和制度经济学。

中,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多是分析华茶外销衰微和转型艰难的切入点。学者们的研究既以宏观的数据呈现了对外贸易的整体趋势,又以比较视野关注了西方世界的主导优势^①。不过,近年来随着历史观念和问题意识的调整,学界认为虽然殖民地茶叶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生活在殖民地茶园中的劳工与中国的业茶者在生存方式上存在着根本区别,与此同时,部分学者还注意到中国茶商在经济意识上是有发生内在变迁的^②。因此,近代中国茶业研究的探讨不应只局限在贸易、组织或技术层面,其他面向还需进一步挖掘。

通过回顾民国时期的茶业调查资料,可以发现众多报告对茶厂中的劳动力数量和生产分工有着比较清晰的记载,不过对劳动力的来源、生活乃至与茶商的关系等则鲜有提及^③。总的来看,学界对这个话题引用较多的一则史料是“隆记行中佐理者百余人,因多取亲友,视其能任以事,人每借以致富,其中尤多族人……”^④,当中的隆记茶行由张殿铨在留心洋务及求教皖浙茶商后,创办于广州十三街。学者对这则史料已作简要分析,认为“‘百余人’中从事制茶的一定不少,不过因多为亲友,其内部关系尚不明确。”^⑤由是,通过选任宗族亲友来从事制茶业的经营案例值得再探讨。

近年来,民间文书的发现拓展了研究主体。以账簿为代表的商业文书多带有商人自身的从业知识、习惯实践以及诸多活动过程。相比其他文献中的质性描述,簿中的记述提供了定量分析的数据来源,可以借此统计、描述以及比较交易成本。

本文将以徽州歙县吴炽甫茶商账簿为核心史料,并辅之以昌溪吴氏宗谱讨论宗族伙计在制茶业经营中的工作面貌^⑥。吴炽甫茶商账簿在近年来受到茶业史研究的关注^⑦,本文将通过对吴炽甫名下的淳安茶庄的考察,详细论述宗族伙计如何基于血缘和地缘优势,发挥其在制茶业中的经济功能,最终既实现了收入来源的重要补充,又节省了茶商的经营成本。

一、茶庄的基本情况

吴炽甫茶商账簿总量约计300册,目前分别由黄山市档案馆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收藏。这批账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Robert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146页;周翔鹤:《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仲伟民:《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② [英]艾伦·麦克法兰、艾丽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扈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Andrew B. Liu,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③ 详见许嘉璐主编:《中国茶文献集成》第23—50册,文物出版社,2016年。

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487页。

⑤ 魏明孔主编,李绍强、徐建青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1页。

⑥ 伙计是商人资本所雇佣的具有自由人身的中下层雇员,族人乡党充当伙计的现象在徽商中比较多见,参见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⑦ 王瀚巍:《近代徽商吴炽甫与内销茶业——以文书材料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马勇虎、马路:《清末民初徽州京庄茶商经营实态研究——以吴炽甫京茶庄商业账簿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章毅、黄一彪:《晚清内销茶商的季节性经营和跨地域流动:以泰昌发介号〈淳庄账簿〉为中心》,《史林》2022年第1期。

簿是茶商遗留的经营全过程的记录,包含了新安江上游流域的多家茶庄,其中一组账簿产生于泰昌发介号派驻在淳安县的茶庄,全名称作“泰昌发介号淳安毛峰庄”(以下简称淳庄)。本文使用的《淳庄账簿》起始于光绪十九年(1893),截止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持续6年,共计10册,现收藏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一)淳庄的商业性质

淳庄是茶叶收购和初加工机构。随着清代中叶茶叶贸易范围的扩大,从事收购毛茶并加以精制的茶栈和茶厂不断涌现^①,与此同时,在产茶区内以收购和销售茶叶为主业的茶行和茶庄也逐渐开始兼营加工制茶,并使之成为一项固定工作^②。这些变化主要与世界市场对中国茶业的刺激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市场也在发生着变化,华北花茶的消费于晚清时期快速兴起^③。基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演变,吴炽甫选择从砖茶贸易转向花茶营销^④,在浙江设立了原料收购并进行初加工的茶庄。彼时,徽州茶商的销售分为“京庄”和“洋庄”两大体系。所谓的“京庄”,是相对于外销“洋庄”而言,市场以京、津及北方地区为主^⑤。关于民国茶商,仁井田陞的《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记载到,“在北京的茶商中,要说吴姓,今天所见的大体也还是安徽人(徽州人即歙县人),要说北京的安徽茶商,也可以说全是徽州人。”^⑥由是来看,对吴炽甫茶商的经营讨论具有个案意义上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淳庄虽直属由吴炽甫管理的泰昌发介号,但每年还是接收了来自北京和天津等地的几家茶号的出资。这些茶号主要由吴炽甫及其兄弟经营,与此同时,吴氏兄弟还在茉莉花产地福州设立了窰花茶栈。淳庄出产的成品茶便是通过新式轮船运至福州,并移交至茶栈进行深加工。而在制茶的过程中,淳庄会挑拣出难以窰花的茶朴、茶末及茶梗等,并将其运销至家族在杭州开设的茶庄。面对分布于全国不同地方的产业组织,吴炽甫通过分派直系亲属至各个环节^⑦,从而构建出家族分工式的产供销经营体系。在此之中,淳庄是吴炽甫家族跨地域商业链条中最为基础的经营主体^⑧。

(二)淳庄的人员结构

淳庄的经营人员主要包括管事和伙计。根据账房的记账习惯,淳庄账簿对不同人员的称呼差异主要基于身份职业的不同。账簿常以“△记”,来代指对应的核心伙计、管事及出资者,其中的出资者是指出资茶号的经营者。上述“△记”最为直接的账簿记录是“仲记即春妹”^⑨,光绪《昌溪太湖吴氏宗谱》记载到,春妹谱名亦贵,字仲山,二十六世族人,相当于吴炽甫族叔(见表1)。

结合宗谱,其他的“△记”身份如下:

表1		“△记”的身份详情			
编号	世系	谱名	宗族身份	△记	庄内身份
01	二十六世	亦贵	锡祉子,春妹,字仲山	仲记	伙计
02	二十六世	亦炳	锡梓子,字绍光	绍记	伙计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七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第158-159页。

② 魏明孔主编,李绍强、徐建青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第399页。

③ 许哲娜:《缔造“花茶时代”——清末以来花茶生产与消费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2014年,第39-56页。

④ 朱益新主编,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歙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688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黄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山市文史》第3辑,1993年,第37页。

⑤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245页。

⑥ [日]仁井田陞:《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岩波书店,1951年,第99页。

⑦ 王瀚巍:《近代徽商吴炽甫与内销茶业——以文书材料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⑧ 有关淳庄的基础研究参见章毅、黄一彪:《晚清内销茶商的季节性经营和跨地域流动:以泰昌发介号〈淳庄账簿〉为中心》,《史林》2022年第1期。

⑨ 《光绪二十年三月立泰昌发介记淳庄流水》,编号JT03140110020002,第33页。

续表1

03	二十七世	世昌	亦炜子,全庆,字炽甫	炽记	出资者
04	二十七世	世玺	亦炜子,振禄,字传甫	传记	出资者
05	二十七世	世型	亦炜子,振寿,字仁甫	仁记	账房 ^a
06	二十七世	世璧	亦炜子,振文	璧记	
07	二十七世	世垂	亦炜子,振均,字绅甫,号宸臣	绅记	出资者
08	二十七世	宗瑞	萃元子,字配乾,号连峰	配记	管事
09	二十八世	云瓔	世昌子,仲麟,字金如	金记	管事
10	二十八世	云鈞	世昌子,石麟,又名敏,字竹如	石记	学徒/实习 ^b
11	二十八世	云鈞	世型子,德麟,字济川,号川如	济记	管事
12	二十八世	云钜	世昌子,瑞麟,又名景云,字福如	福记	——
13	二十八世	云铭	世堡子,福全,字诵先	诵记	——
14	二十八世	云洮	世增子,元麟,字清如	清记	——

资料来源:光绪《昌溪太湖吴氏宗谱》,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第17册第065、070、072-073、075-078、088、091、093-094页。

说明:a:账簿中的“传兄绅弟来淳”表明账房身份。“传”应该是吴世玺,“绅”则是吴世垂,两人均属吴炽甫胞弟。在吴炽甫胞弟之中,吴世型和吴世璧两人在“传兄绅弟”位次之间,其中一人或为账房。b:吴石麟,光绪五年(1879)生,至光绪十九年时年仅14岁。庄内身份援引的例子参照胡适自述“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表1显示,具备“△记”身份的成员多和吴炽甫有着直系血缘或密切的族亲关系。除两位年资比较久的伙计外,普通伙计可能不具备被账簿以“△记”形式记录的资格。与此相对的是,账房常用“各伙”或“各友”之名统称伙计群体。在伙计之中,比较显著的特征是超过九成以上的伙计称谓不带有姓氏。但方正大、方长泉、王访贵三人除外。淳庄合作的代理商称作“方三多”,此人正是渡市镇的丹阳方氏六十九世族人,长子名长全,该宗族六十九世之中也有以“正”字排行取名^①。因此,前两位多有可能来自丹阳方氏,王访贵暂不详。面对其他人员,账房在记录时则多强调职业身份,以“船户”“簍工”等直接称呼,又或是姓名之后再加职业身份,如“陈顺招舟人”^②。

基于上述讨论,淳庄的人员大致可以分为非宗族成员和宗族成员两类。如图1所示,其中的非宗族成员包括临时伙计、簍工、拣工、船户和代理商等。临时伙计指的是淳庄在本地的临时雇用人员,账簿中方长泉的工作一栏注明“帮忙”二字^③,表明了他的临时伙计身份。簍工又称火司竹匠,来自歙县的深渡镇。淳庄在镇上的竹匠店购买簍簋,竹匠店则外派簍工至淳庄工作,工资和路费由淳庄支付。拣工、船户和代理商则是本地人,他们分别负责拣茶、运输和代理工作。而宗族成员可划分为吴炽甫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两类。其中的家族成员包括吴炽甫的兄弟子侄(见表1编号05、06、08、09、10和11),他们的工作表现在统筹业务、掌管资金和管理人员等。至于非家族成员,像表1的春妹(编号01)和绍光(编号02)在宗谱世系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录,他们是本文关注的宗族伙计,当中的少数成员还可通过考课升任至管事。

① 方国华主编:《新修《丹阳方氏宗谱》》,2012年,第176-177、180、184页,原版存淳安县亚山村。

②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吉日立泰昌发介号淳庄茶号收支银洋钱总并誊清各序》,编号JT03140110020004,第19页。

③ 《光绪贰拾四年三月泰昌发淳庄收支银洋钱总并誊清各序》,编号JT03140110020008,第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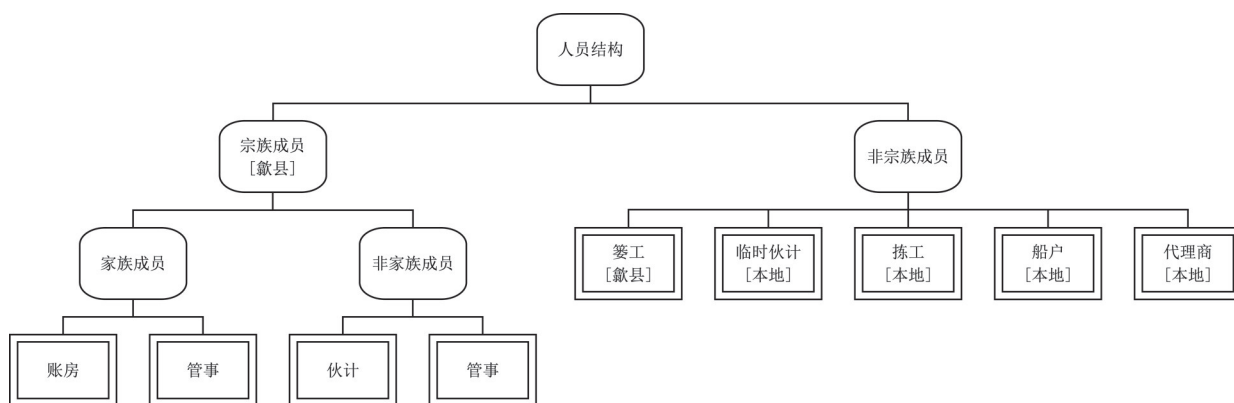


图1 淳庄的人员结构

资料来源：《淳庄账簿》，编号 JT03140110020001、JT03140110020004、JT03140110020008、JT03140110020014、JT03140110020017。

（三）宗族伙计的考证

账簿中九成以上的伙计没有记载姓氏，这是因为账房在记录他们时统一省去了“吴”字。既然同出自歙县的昌溪吴氏，与吴炽甫家族成员同族，姓氏也就没必要重复出现了。不过，宗族和家族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差异，宗族的聚合方式在于强调祖先凝聚^①，淳庄作为宗族的一部分，表现之一是代缴了4元英洋，用作“永评祖茔修什捐输”^②。寺田隆信在他的研究中提及过永评祖先，“昌溪吴永评”曾在乾隆年间参与北京歙县会馆的义阡捐输，是会馆记录中比较早出现的茶商^③，查阅宗谱，吴炽甫远祖的身份无疑^④。随着宗族经商的发展，至清中后期，昌溪吴氏族人外迁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不少转变为侨居异乡，迁居至仁和县、钱塘县、平阳县、吴县、上海县、南通州、苏州及北京等地^⑤。这些外迁的同族成员与吴炽甫家族之间的宗族关系难免淡化。

不过，伙计常年定居在歙县的昌溪村，工作期间则住在淳庄。账簿的记载显示，他们经常托庆妹等人转交工资至“里”中的“父”或“母”。有关庆妹，宗谱记载为二十六世族人，伙计与其属同一辈分的还有八顺，相似名称的则有二十七世灶顺等^⑥。那账簿中的“里”具体指何地？比对活动轨迹，光绪二十二年（1896），伙计将行李由“里”挑至“深”（歙县深渡镇），再过“深”至“进贤”（淳安县渡市镇），光绪二十年（1894）则记载行程为“家至淳”^⑦（见图2）。由此确定，“里”是“乡里”的简写。“父”和“母”可理解为“家父”和“家母”，比如说光绪二十四年，顺庆和吉祥委托庆妹将工资“手交伊父收”，春林和八顺则委托庆妹“手交伊母收”^⑧。上述这些活动轨迹表明他们尚未外迁定居，同乡同族身份得以确认。

根据账簿记载的人员名称，可以推算出平均每年有14名伙计在淳庄参加工作。六年内相继出现过30余名不同称呼的伙计。其中，三成伙计的工作年限长达5年以上，工作3至4年的将近二成，但高达五

① [英]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周琳、李旭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②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吉日立流水》，编号 JT03140110020005，第44页。

③ [日]寺田隆信，潘宏立译：《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光绪《昌溪太湖吴氏宗谱》，第9册241页。

⑤ 光绪《昌溪太湖吴氏宗谱》，第17册44、109、1136页；第18册19、30、62、130、111、139页；第19册124页。相似的例子见北岸岔口吴氏，同样经营茶叶生意，总计宗谱中的外迁人口高达715人，参见贾晓阳：《清代“以商辅农”的乡村经济——以歙县北岸吴氏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⑥ 光绪《昌溪太湖吴氏宗谱》，第17册第51、65页，第19册第68页。

⑦ 《光绪丙申泰昌发介号立银洋钱总并眷清各款序》，编号 JT03140110020017，第5页；《光绪二十年三月立泰昌发介记淳庄流水》，编号 JT03140110020002，第5页。

⑧ 《光绪贰拾四年三月泰昌发淳庄收支银洋钱总并眷清各序》，编号 JT03140110020008，第31页。

成比例的伙计却只工作了1至2年。除去临时伙计,该职位平均每年的离职率为14.7%,新进率则达到25.5%,表明淳庄处在经营的扩张成长阶段。由于现存账簿时间序列的中断,导致光绪二十四年之后连续几年的伙计情况不详。但好在现有研究公布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名录,共21人^①。整合这年人名,其中的7人至晚自光绪十九年(1893)起连续工作,3人在6年之中工作了4至5年,以及两人分别工作了3年和1年,其余9人则未出现在本研究时段中。就数年内的人数变化来说,族人辞职或者新加入的现象比较常见。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结束之后,返乡即可就地解散,至新的一年,吴炽甫又会在乡内组织和安排,当伙计们共同抵达淳庄之后才又开始新一轮的收购和加工工作。围绕上述过程,不难发现,淳庄可以凭借同乡宗族在地缘和血缘上的优势,积极发挥灵活和便捷的特点,进而减少招募、管理和解散伙计等的交易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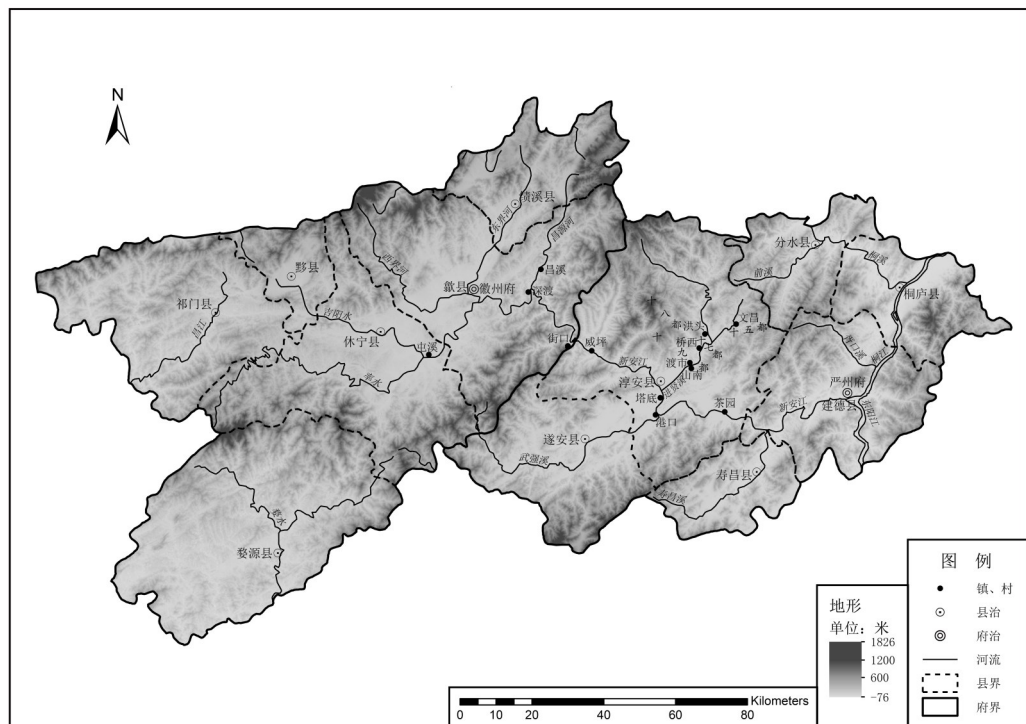


图2 淳庄的地理位置

资料来源:底图数据来自 CHGIS V6 (<https://sites.fas.harvard.edu/~chgis/data/chgis/v6/>); 高程数据来自 GDEM V2 30M (<http://www.gscloud.cn/>)。

作为泰昌发介号派驻淳安的经营主体,淳庄处于吴炽甫家族产业链中的基础环节,核心业务是进行茶叶原材料的收购、茶叶初级产品的加工。执行这些工作的伙计主要来自歙县昌溪村的昌溪吴氏。宗族血缘成为雇工与雇主间的一种关联,相比上文账簿描述其他职业的身份,“各友”一词凸显了吴炽甫与伙计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淳庄对宗族成员来说,相当于为他们寻求工作提供了比较直接的选择机会。

二、宗族伙计的工作选择

如图2所示,昌溪村位于歙县南乡的三十一都,距县城约60里,村落两侧以山地、丘陵为主。据调

^① 人名参见马勇虎、马路:《清末民初徽州京庄茶商经营实态研究——以吴炽甫京茶庄商业账簿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查,歙县的土地类型主要是山地,其中茶地达到了94000余亩,可年产茶4万余担^①。南乡虽作为主要的茶产区,水稻的产量却居于其他乡都之末^②。相当多的农民不得已外出工作,以换取生活物资。20世纪3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提出满足乡村农民生活需求的手段主要有物资输出和劳务输出两种。劳务输出表现在辞别亲友,外出谋生而换取现金,歙县当属这种类型^③。吴景超即是出生于茶业发达、茶商辈出的南乡,不难推测他的观点源自于他对乡村生计的体验^④。而淳庄作为吴炽甫在异地他乡开设的茶庄,有效地为宗族成员提供了以工补农式的谋生支持。

(一)伙计的工作时间

伙计参与淳庄的工作时间集中在公历的4月底至7月中旬(见表2)。淳庄多提前向茶贩预借现金,伙计在既定的“行场”予以收购,以方姓为主的茶贩则在期间内“以茶来归”^⑤。淳庄每年开庄的时间不足三个月,相对周边的方姓大族来说,伙计季节性活动的“客边”身份明显,固定的收茶方式可以减少他们在异地的麻烦。不过,相较于方姓宗族,伙计均以异籍他姓的身份承担起本地茶贩交易的对象,换言之,“客边”的作用表现在贸易过程中成为脱胎于血缘之外的商业活动的媒介^⑥。

不过,伙计的工作时间却在整体上与茶季旺期脱节。茶庄的季节性经营是学界熟知的特点。通过梳理账簿的记录,可知伙计虽然到庄不久就开始收购,但他们开始劳作的时间远晚于茶叶的春季开采期。账簿记载收购的茶叶品级有雀舌、雨前、极品、贡品、提品及莲芯等数类,根据名称,其中的雀舌多是茶农在公历的3月份采摘,雨前则是在谷雨节气之前。但伙计的收茶起始于公历的4月底5月初,即使与谷雨相比,还是晚了10余天。不论是直接的时间记载,还是茶叶的品级名称,都显示出伙计收茶的开始时间不同于我们的常规认知。这也说明伙计所收茶叶可能经过了茶农和茶贩的前期加工,本文第三节会对此做详细说明。

表2

宗族伙计的工作时间

年份	离乡 到庄日期	收茶 起止日期	离庄 返乡日期	工作 天数[工数]	工数占 全年比例
1893	4.27	4.28—5.21	6.30	64	17.5%
1894	4.29	不详	7.13	75	20.5%
1895	5.04	5.05—6.27	7.15	73	20.0%
1896	4.28	5.03—6.23	7.09	73	19.9%
1897	4.28	4.29—7.12	7.20	83	22.7%
1898	4.29	5.02—7.11	7.26	88	24.1%
平均	--	--	--	76	20.8%

资料来源:《淳庄账簿》,编号JT03140110020001、JT03140110020004、JT03140110020005、JT03140110020008、JT03140110020014、JT03140110020017。

说明:农历日期统一换算为公历日期。

除淳庄的季节性经营外,伙计难以完全抽身于农业耕种,从而缩短了其在庄内的劳动时间。表2显

①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编:《中国经济志·安徽省歙县》,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第1页。

② 民国《歙县志》卷3《物产》第1b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

③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76—180页。

④ 吴景超:《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癸亥级刊》1919年,第107—117页。

⑤ 马勇虎、马路:《清末民初徽州京庄茶商经营实态研究——以吴炽甫京茶庄商业账簿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示,伙计的工作时间只占据了全年的20.8%。新中国《歙县志》记载,昌溪乡内有水田125亩、旱地430亩、桑园1615亩,而茶园面积高达4741亩^①。如此大量的茶园面积在茶季亟需众多劳动力,每年公历的3、4月份又是茶叶采摘最为忙碌的时期,妇女和孩童难以独自承担乡内的茶叶采摘、加工、运输乃至贩卖等诸多工作。又以徽州一年两熟的粮食耕作来看,水稻最早4月初,最晚5月中旬播种,收割则最早在7月中旬,最迟9月底;小麦播种最早在9月,最迟11月,收获最早在翌年3月,最迟在翌年5月;大麦和玉米的播种期分别与小麦、水稻略同^②。结合这些农业周期,可以说,淳庄的工作时间安排使得伙计在非雇佣时间之外能够尽可能从事家乡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进而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在赚取淳庄工资的基础上,提高家庭的年收入。

(二)伙计的工资构成

伙计的工资结算包括记账的货币工资以及包含工食、住宿、理发等在内的实物与隐性工资和福利等。平均每位伙计大概可得11.5元记账工资,由基本工资、路费与酒钱三类构成。基本工资基于工作天数与个人工价测算,不同地位和职责的伙计工价差别在100至160文之间不等。除去信差等专职的工价外,伙计的工价平均在120文,100文作为最低起点,随着年资积累,工价会有相应的调整(见图3)。常驻伙计的路费统一为1元,相当于6至10日的工价;酒钱则与工价挂钩,分有5个层级,累进200至500文以及1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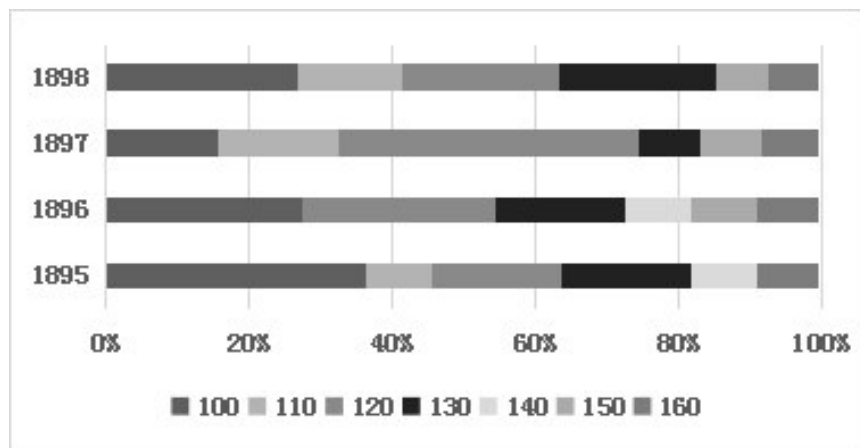


图3 常驻宗族伙计的工价分布(单位:文[制钱])

资料来源:《淳庄账簿》,编号JT03140110020004、JT03140110020008、JT03140110020014、JT03140110020017。

伙计的食宿统一由淳庄提供。在日常主食上,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例,淳庄累计购买9.54石白米。该年共17人(含管事)长期在庄内工作,平均每人每天食用白米0.68升^③。与生活交易相关的商号主要有:乾丰、广大、允裕、咸泰和同益。匹配民国档案,明确可知的有乾丰、咸泰和同益等数家以经营酱园、杂货等为主,经理人均均为徽籍人士^④。地缘成为伙计与这些商号交易的重要因素。相较于伙计和吴炽甫之间的同族关系,共同的徽籍促使这些没有血缘关联的人相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是从商业里发展出

① 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歙县志》,黄山书社,2010年,第123页。

② 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安徽段经济调查总报告书》,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1930年,第99页。

③ 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四年,淳安县米价持续高升,根据账簿推算,由2.56元/石上涨至4元/石,工食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伙计收入受物价波动的影响。米价高涨的背景参见吴媛媛:《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以〈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为例》,《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

④ 《淳安县酱坊商业同业工会第一届当选职员名册》,浙江省淳安县档案馆藏:档案号M001-012-0088-058;《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浙江淳安县商会执监委员会姓名表》,档案号M001-012-0088-013;《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造送淳安县商会会员名册》,档案号M001-012-0088-030。

来的社会关系,是契约社会的基础^①。伙计固定选择在这些商号支取生活物资,定期通过账摺结算。所谓的账摺,多指折叠成摺的单张账纸,结算属赊账形式。商号立摺并记录了淳庄的消费记录,以此作为凭证,结账时可与之对账。据此计算,淳庄向伙计贴补了人均6.97元的生活消费,其中明确以账摺形式结算的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稳定在四成左右(见表3)。

项目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平均
[1]账摺 结算支出	乾丰	5.36	10.07	7.06	5.61	10.00	7.66
	广大	5.68	9.12	8.17	9.00	17.34	11.14
	允裕	10.92	5.35	9.84	5.96	8.40	10.29
	咸泰	3.46	5.93	4.49	6.01	6.23	7.34
	同益	7.37	6.12	8.23	13.35	13.75	8.94
[2]生活消费支出总计	83.93	106.31	88.70	100.22	151.45	180.59	118.53
[3]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6.00	6.25	5.22	6.26	8.41	8.21	6.97
比例([1]/[2])	39.1%	34.4%	42.6%	39.8%	36.8%	38.4%	38.3%

资料来源:《淳庄账簿》,编号JT03140110020001、JT03140110020002、JT03140110020004、JT03140110020008、JT03140110020014、JT03140110020017。

说明:比例指账摺结算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总计的比例(%)

累计上文的记账工资和生活消费支出,平均每位伙计可节省并赚取18.47元,前者占到总工资的六成以上。对比同一时期的其他行业雇工的工资货币化程度,例如北京燃料铺工人的现金工资占总工资(即现金工资与食物津贴之和)的40%,浙南石仓乡村农业与非农业雇工的工资货币化则普遍在20%以下^②,淳庄虽远离城市,但行业的商业化特征使得工资的货币化程度较高。

(三)伙计的激励制度

徽商常用薪金、奖金及职位提升等^③激励宗族伙计。除了上文分析的工资(账簿称粗工/辛金)外,淳庄没有留下专门的激励制度细则,但匹配伙计历年的工资记载差异,结合晋升和奖金的相关案例仍可推测伙计晋升和获得奖金的运行规则。

其一,从学徒晋升为伙计。名为隆贵的伙计工钱记录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光绪十九年,隆贵“在行照应65天”^④,酬劳仅为2元,当年账房将此支出归于“杂支”项。次年,酬劳上涨至3.5元。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隆贵的工钱逐步上涨,此时账房将此支出并入“粗工”项,仍是一次性结清。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账簿详载了工价、工数、酒钱及路费等,其工资构成与其他伙计一致,共计9.565元。

其二,从伙计晋升为管事。名为子兰的伙计虽不在吴炽甫亲属圈的核心之中,但亦可升任为管事。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他的工资记录在“粗工”项,按照数项工资构成累计总额。光绪二十一年起,工资记录挪至管事的“辛金”项,至光绪二十四年,工资增长至24元。除此之外,称呼记载从“子兰”改为“子记”,进一步预示着职位的晋升。

其三,酬劳奖励。淳庄给晋升后的管事子兰3元奖励,当年账簿加注曰“因今年货多,人手略紧,各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1页。

② Sindey D. Gabmle, *Daily Wages of Unskilled Chinese Laborers, 1870-1902*,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3, No. 1, 1943, pp. 41-73.; 蒋勤、王泽堃:《清代石仓的雇工与工资(1836-1870)》,《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④ 《光绪十九年三月立泰昌发淳号银洋钱总并眷清各序》,编号JT03140110020001,第85页。

友颇耐劳,所以另给酬劳”^①,此语似有称赞其管理众伙计得当之意。不过关于普通伙计的酬劳情况,内中未有记载。

总体而言,虽然伙计的工资结算于返乡前完成,但他们提前支取的行为非常普遍。而按照米价年均3.38元/石计,每位伙计近三个月的劳力回报相当于个人两年的生活口粮。虽说他们在外工作数月,行动空间与生活方式受到较大的限制,难以在工作期内返回家中,但淳庄又特意安排人员“代带里家用”^②,即代为转交,由是可直接通过现金来补贴家用。

三、工作安排:来自交易成本的视野考察

商人选用宗族伙计的出发点不仅在于对这些人员的了解,便于通过亲缘、乡缘关系进行管理和控制,还在于利用与维系社会人际关系,从而形成内在向心力,促进商业经营的持续发展^③。落实至本文的淳庄,上述面向的表现之一是宗族伙计在招募、管理及解散等方面的特征。但不同的行业有着各自对应的经营特点和需求,以淳庄的地理方位为例,宗族所在的乡里与之至少相隔了155里路程,故而作为经营主体,淳庄不得不增加额外的支出^④。但事实上,每一项交易都具有不同的属性,并且需要匹配它对应的治理结构,从而才能实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⑤。因此,我们将基于对伙计工作项目的讨论,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指出吴炽甫为何宁愿增加交通费用来雇佣宗族伙计的动因。

(一)工作项目与分工详情

多数情况下,账簿中有关交易的收和支可视作淳庄人员执行工作的表现,分析视角转换之后,他们承担的工作项目就能有所展现。除了茶叶的收购、加工与运输外,工作项目还包括以下几类:行场预定、货币兑换与搬运、物资采买、钱洋兑换、税捐完纳、信件寄送、粗茶售卖、货物代购等。因吴炽甫家族僻处歙县山区,伙计作为宗族成员,外运茶货返乡之时,亦肩负起在杭州、宁波等地代购生活物资的角色。

表4梳理了不同人员承担相应工作项目的大致情形。

工作项目	伙计			拣工	篓工	船户	管事	代理商	其他
	单人	多人	集体						
行场预定	+								
银洋兑换	+	+				+	+	+	
英洋搬运	+	+	+			+	+	+	
洋钱兑换	+	△				+	+	+	
茶叶收购	+	+	△						
物资采购	+	+	+			+	+	+	
茶叶烘焙			△						
茶叶挑拣				+					

①《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吉立泰昌发介号淳庄茶号收支银洋钱总并眷清各序》,编号JT03140110020004,第49页。

②《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吉立泰昌发介号淳庄茶号收支银洋钱总并眷清各序》,编号JT03140110020004,第88页。

③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第222-223页。

④里程资料参见[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光绪《淳安县志》卷3《方輿志》,第6a页,光绪十年(1884)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08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影印本,第281页。

⑤[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契约、治理与交易成本经济学》,陈耿宣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续表4

篾簪加工				+			
茶叶装篾			△				
茶叶运输	+		△		+		
粗茶售卖						△	
行场打扫							△
税捐完纳	+				△	+	+
信件寄送	+						
货物代购	+				+	+	

资料来源：《淳庄账簿》，编号 JT03140110020001-JT03140110020005、JT03140110020007、JT03140110020008、JT03140110020014、JT03140110020017。

说明：+、△表示参与此项工作，+是根据账簿收支记录中的人名判断，△由笔者推测。

以上这些工作可分为伙计独自负责、数名协同或者集体参与，以及其他雇工或商号单独承担又或者共同协作完成等模式。随着工作内容的变化，活动地点扩展到徽州、严州、杭州、绍兴与宁波等所属的县域，但在此之中，只有少数资历深厚的伙计前往了新安江流域以外的地区。多数伙计的工作集中在英洋的搬运、物资的采购以及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故而这些项目成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人、物与资金的共同流动

伙计从昌溪村前往淳庄的同时，既顺道解决了物资的购买，又保障了资金的安全运输。调查显示，淳安县的西乡多产制外销茶，但东、南及北三乡以本庄茶为主^①，其中的小源乡烘青多销售至东北和华北，集中在十五都村^②。渡市镇正位于十五都村下游，足见择址的区位要素是以原料供应为核心，保证货源的稳定成为首选目的。淳庄也因此远离了每年收取和兑换资金的地点——休宁县屯溪镇。研究指出晚清时期的屯溪镇已是整个徽州金融业和茶业周边产业集聚的中心^③，但统计里程可知，此地与淳庄相隔至少255里路^④。面对这种情况，吴炽甫挑选几位年资较高的伙计，从昌溪村启程，前往屯溪镇的钱庄兑换钱票并搬运现金。光绪二十四年，伙计兑换、肩挑以及船运英洋11300余元^⑤，净重逾600斤。其中，屯溪镇至深渡镇的人力运输成本接近一位伙计80天的记账工资。自深渡镇至昌溪村一线，每人肩挑数百斤的英洋徒步山路。返乡后，数十名伙计集体搬运物资和钱财至深渡镇，随之雇佣船只前往淳庄。在经过沿途市镇时，伙计以淳庄的名义购买了不少经营和生活物资。

除去山路小道，上述水运河道均在新安江水系中，但主干水流湍急，险滩中乱石密布。其中，深渡镇至街口镇“乱石纵横，状多怪特，舟行其间，如入八阵图中，目为之眩”，街口镇至威坪镇又“间多险滩……巨石累累满河……舟行其间，危险万状。”^⑥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在第二次访问中国采集茶树时，曾乘船于此。他在回国后回忆这段水系的险滩上聚集了大量乞丐船只，常会发生

① 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编：《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上海大文印刷所，1934年，第45页。
② 陶秉珍：《淳安遂安茶产调查报告》，《浙江农业》1940年第26-29期。
③ 邹怡：《产业集聚与城市区位巩固：徽州茶务都会屯溪发展史（157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2009年，第1-54页。
④ 里程资料参见[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第273页；光绪《淳安县志》卷3《方輿志》，第6a页。
⑤ 《光绪貳拾四年三月泰昌发淳庄收支银洋钱总并誊清各序》，编号JT03140110020004，第4页。
⑥ 钱兆隆：《钱塘江上流游记》，《地理杂志》1931年第4卷第2期。

纠缠骚扰的现象^①。在此背景之下,携带高额现金的伙计通过集体活动的方式,实现了人、物与资金的共同流动(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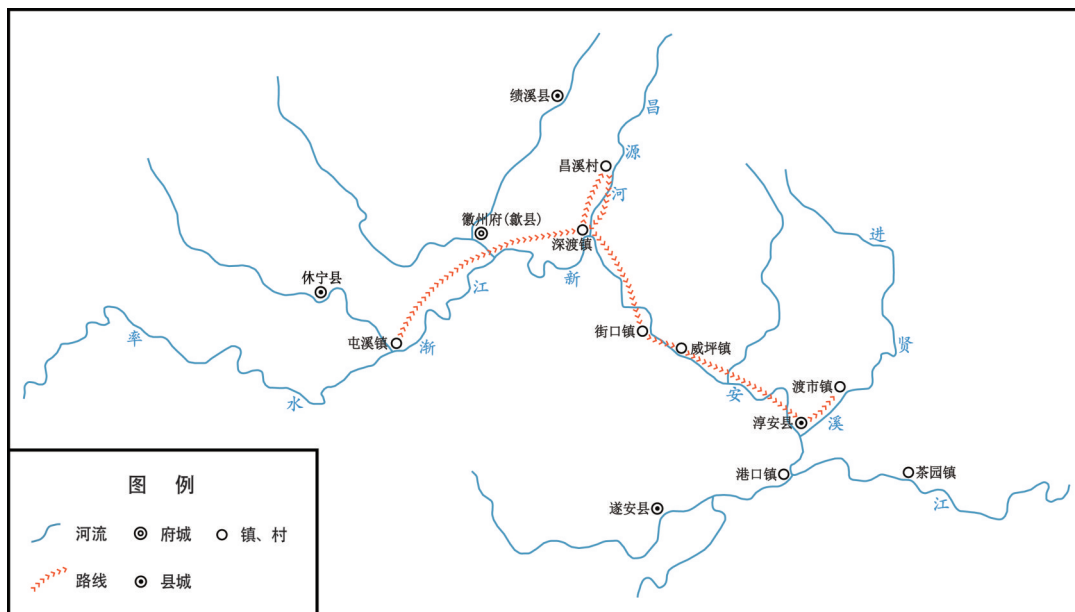


图4 宗族伙计搬运资金的路线

资料来源:底图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第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18-19页。

(三)高体力消耗而轻加工步骤

伙计到达淳庄之后不日便开始收购和加工茶叶。不过,伙计对于茶叶的加工很可能只进行了“烘”的工序,而加工流程中的“炒”和“揉”则多由茶农和茶贩完成^②。一般来说,加工鲜叶的三道标准程序,依次为炒制入锅、茶床揉搓以及装笼烘干,通常四斤鲜叶可烘制一斤毛茶^③。而成书于光绪二十二年的《浙志便览》记载,内销绿茶通过毛茶再加工后即可销售,重量维持旧有的八、九折^④。窰制花茶的茶叶原料主要由烘青绿茶经过精加工所得^⑤,但通算淳庄烘制后的成品率,平均高达93.0%,据此比较,淳庄所收茶叶远比通俗惯称的鲜叶和毛茶更为干燥。茶叶的成品率表明所收茶叶已经过相当程度的脱水处理。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伙计到庄收茶的起始时间比较晚。

为了衡量伙计在收购和加工中的体力支出,本文统计了茶叶的重量以及相应的劳动数量。账簿中的测量单位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庄秤、平秤、关秤(又称税秤)和杭秤等四种。本文依据海关英制关平秤与民国通用市秤的标准申折^⑥,以及通算簿中所有的相关数字,测算出每庄秤约817克,即折合1.63市秤斤。六年来,产制的成品茶由39,569市斤快速增长至100,616市斤,平均年产61,642市斤,占到全县内销

① [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1-242页。

② 成文于光绪二十三年的《整饬皖茶文牒》记载山户会先“炒焙”茶叶,参见陈祖槃、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198页。有关茶农商贩加工的案例参见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董乾坤:《社会关系与日常经济网络的形成——以胡廷卿家庭收支账簿为中心》,《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陶秉珍:《淳安遂安茶产调查报告》,《浙江农业》1940年第26-29期。

④ [清]李应珏:《浙志便览》卷3第38b页,光绪二十二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80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影印本,第363页。

⑤ 夏涛主编:《制茶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第330页。

⑥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9、234页。

茶的10.1%左右^①,足见淳庄茶叶在本地的市场份额。至于劳动数量,考虑到管事的工作和临时伙计的工资,他们的单位劳力折半统计。

年份	人数		工作总量[人均]		连续收茶天数	收茶量[每日人均]
	常驻伙计	管事/帮忙	收购/烘焙量	打包/装舟量		
1893	12	1	3,469	3,166	21	165
1894	15	1	3,969	3,700	/	/
1895	13	4	3,503	3,360	27	130
1896	12	4	4,273	4,017	31	138
1897	13	4	4,748	4,378	43	110
1898	17	4	5,717	5,296	36	159
平均	14	3	4,270	3,977	32	133

资料来源:《淳庄账簿》,编号JT03140110020001、JT03140110020002、JT03140110020004、JT03140110020008、JT03140110020014、JT03140110020017。

说明:临近收茶尾期,账房记账的收茶时间多以数十天甚至按月记载,但收茶量不高,这一时段并不代表每日进行了收购。因此,计算时除去了这些不具连续意义的收茶活动。

如表5所示,平均每位伙计承担收购和烘焙茶叶原料4,270市斤,分批装篓成品茶3,977市斤,并将此搬运至渡市镇的渡口。根据时间间隔,每位伙计的日均收茶量高达133市斤。这些数据呈现了伙计高体力消耗的工作特征。由于伙计收购的是已经过相当程度加工的茶叶,伙计的专业制茶核心技术集中于烘焙工序上即可。这种轻加工的模式自然比较利于宗族成员的雇佣,工作的准入门槛也相对降低。值得强调的是,拣茶工作也无须伙计负责。账簿的支出表明,这项工作比较吃重,因此支付给所有拣工的工资可以达到全部伙计货币工资的2至3倍。

淳庄通过缩减加工步骤,将伙计的重体力劳动集中在特定的工序上,如此便可节省不少经营时间。民国年间,由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部编写的《浙江省之茶厂管理》记载,淳安县茶司的全期工作以100天为中心^②,淳庄的伙计年均工作时长只有76天,故而即使调查中的时间略微泛指,两者仍相差了不少天数。此外,有关福州花茶的调查显示,相比福建本地的窈花,徽商在时间成本上不占优势,与其他茶帮相比,徽商抵达窈花茶栈的时间要晚一些^③。这也从侧面解释了淳庄工作安排和伙计工作特征的特殊之处。

实际上,相比淳庄的各项开支,以内河水运为主的交通费用并不算高。淳庄通过宗族成员解决或者说保障了资金与货物运输的同时,完成伙计的就位,实现劳动力的资源配置,这是合乎现实的理性交易。适逢茶季进入末尾之时,淳安县的茶叶大致粗制完成,宗族成员转身成为淳庄的伙计,在较短的时间内购得充足的茶叶,并凭借比较简易的烘焙和装篓,完成制茶工作。

① 成品茶包括正货和粗货两类,分别占到八成和二成的比例。光绪三年(1877),淳安县运往宁波出口的绿茶产量约5,000关秤担;民国年间,淳安县内销北方的茶叶量达5,200篓。其中,1关秤斤折合1.21市斤,每篓约重95市斤,参见《光绪三年浙海关贸易报告》,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魏颂唐编:《浙江经济纪略·淳安县》,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选编:《民国浙江史料辑刊·第一辑》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426—427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托部,1931年,第24页。计算公式如下:10.1%=[(61,642/100)/(5,000*1.21)]+(61,642*80%)/(95*5,200)]/2*100。

② 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部编:《浙江省之茶厂管理(二十八年度)》,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本,第38、40页。

③ 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1929年,第163页。

结 语

近年来与茶业有关的具有地域特征的民间文书的新发现推动了茶业研究的精细化与个案化。本文通过分析吴炽甫茶商账簿和昌溪吴氏宗谱,对晚清时期泰昌发介号淳庄中的宗族伙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结论可分别基于伙计和淳庄的视角展开。

从伙计的角度出发,他们来自徽州歙县的昌溪吴氏,由于伙计尚未完全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只能凭借周期性的以工补农,受雇于同族吴炽甫名下的浙江淳庄,通过跨地域流动,实现生活来源的多样化。在具体工作上,烘焙是伙计在制茶工序中所承担的关键步骤。藉以近三个月的工作,伙计所得的全部工资相当于个人两年的口粮,对其生计来源的补充大有裨益。

而对淳庄来说,宗族在伙计的招募、管理和解散等环节上表现出比较便利和灵活的优点,与此同时,宗族伙计的参与可以实现人、物与资金的共同流动,进而降低货物与资金的运输风险。淳庄通过对宗族伙计的合理安排,有效缩减加工步骤,节省了诸多交易成本并缩短经营周期,从而能够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

要之,淳庄宗族伙计的活动面貌呈现出他们在制茶业上的经济功能,茶商吴炽甫对他们的雇佣不只是出于血缘身份的考量,当中的工作更是茶商契合宗族关系、地理环境和农业周期的理性交易的表现,是与所处社会和环境相嵌套的制度安排,具有双方互益的优势。

(责任编辑:胡文亮)

[参 考 文 献]

- [1]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J].历史研究,1986,(2).
- [2]马勇虎,马路.清末民初徽州京庄茶商经营实态研究——以吴炽甫京茶庄商业账簿为中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 [3]章毅,黄一彪.晚清内销茶商的季节性经营和跨地域流动:以泰昌发介号《淳庄账簿》为中心[J].史林,2022,(1).
- [4]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5]陈祖槃,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 [6]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 [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8]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9]许嘉璐主编.中国茶文献集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 [10]夏涛主编.制茶学[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 [11]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21.